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编辑出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中心主任：徐拥军

副总编辑：张安民

编委会

主任：秦宣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永贵 王传利 刘同舫

孙代尧 肖贵清 辛 鸣

辛向阳 张士海 张云飞

陈曙光 邹庆治 项久雨

赵义良 秦 宣 唐爱军

陶文昭 董树彬 韩庆祥

学术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安薪同 仇纳青

出版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大街甲59号文化大厦

电 话：(010)62515819 62515820

电子信箱：fzbjb2017@163.com

刊 号：ISSN 1674-4195
CN11-5752/A

出版日期：每月2日

“两个结合”研究

3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的现代智慧析论 韩喜平

18 “第二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

方法论创新及时代价值

陆卫明、姚文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7 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张雷声

3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刘 洋、王恩祥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45 何谓“中国式”？

——现代化的中国原理

陈曙光

63 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超越及其普遍性意义

张 明

79 现代化多样性的内在理据和重大意义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考察

张有奎、章翔

88 中国式现代化的复合叙事

赵勇、何政韬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101 系统集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跃迁及

实践进路

张永刚、贾云飞

111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话语体系的叙事逻辑与功能向度

赵亚楠

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

122 超越“终结”与“冲突”: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

建构逻辑与叙事理路

张淑娟、余立俊

134 索引

136 英文目录

印刷: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82-191

订购:全国各地邮局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

中心市场部

订购电话:(010)82503412/38/39/40

(010)82503029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人大支行

户名: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账号:344156031742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399信箱)

广告热线:(010)62514919

广告发布登记证:

京海市监广登字20170128号



人大转载 马理学界

启事

敬请文章被全文转载的作者与书报资料中心联系稿酬事宜。

电话:(010)62515937

(010)62513249

DOI:10.26999/j.cnki.nxds.2026.02.002

系统集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跃迁及实践进路

张永刚¹, 贾云飞^{1,2}

(1.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2. 广西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以系统思维统筹改革任务、破解改革难题、提升改革效能,并分别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作为“十五五”时期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系统集成是系统思维的“实践场”,是“十五五”时期应对改革系统性、复杂性难题的重大范式跃迁,需在坚持系统集成基础上,构建“原则—目标—路径”的分析框架,以解析其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逻辑。系统集成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遵循“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三大核心原则,以“整体集成、要素协同、动态适配”为跃迁维度,构建“制度上系统谋划、机制上协同部署、举措上动态调适”三位一体的实践范式。系统集成方法论是对传统改革模式的历史性超越,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驾驭复杂性难题的系统方案。

关键词:系统集成;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范式跃迁;“十五五”规划建议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26)02-0008-08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十五五”规划建议,表明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阶段。全会从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深层次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对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提出新要求。新征程上,改革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特征愈发凸显,只有做到各项改革举措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动态适配,才能确保改革效能提升和改革目标实现。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系统集成的方法论跃迁及其实践进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系统集成是破解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提升改革整体效能的关键方法。研究观点指出,“系统集成是系统观念指导下以综合统筹设计实现目标整体性能最优的科学方法论”^[1],“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更加注重系

统集成的最终目的是进一步健全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2]。基于此,从原则遵循、目标系统与实践方略三重维度,深入剖析系统集成何以成为一种范式跃迁,以阐明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新的原则指引、目标聚焦与行动范式的重要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一 原则遵循:系统集成方法论范式跃迁的基本准则

系统集成作为一种方法论跃迁,其核心在于形成应对复杂改革系统的认知框架和行动准则。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超越了早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模式与中期“重点突破”的攻坚范式,其更加强调以“系统集成”的范式跃迁推动各项改革举措的

收稿日期:2025-1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世界历史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研究”(23BKS117);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系统论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2024KY0085)

作者简介:张永刚(1982—),山东德州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研究。

引用格式:张永刚,贾云飞.系统集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跃迁及实践进路[J].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48(2):8-15+89.

协同联动、实现整体效能的最大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3]这一重要论断阐明了系统集成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要求遵循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三大核心原则，以避免局部改革与整体部署脱节，实现各改革层级、领域、主体间的政策协同、效能提升。

1. 整体性原则：超越局部优化

整体性原则本质上是一种“系统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系统观与现代系统论深度融合的产物，其核心要义是将全面深化改革视为有机统一的整体，通过把握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社会有机体的属性，从根本上推动改革从局部优化到全局考量。遵循整体性原则并非否定局部优化的价值，而是要求局部改革始终服从整体目标，形成各领域、各层级协同联动的改革体系，从而实现“整体效能大于部分总和”的涌现效应，破解局部合理但整体失效的“合成谬误”。

遵循整体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世界的普遍联系特征，表明了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恩格斯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4]人类社会作为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众多领域相互交织的统一有机体，深刻体现了世界的普遍联系性与整体性，也决定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要遵循整体性原则。改革中各领域既相互成就，也互相制约。只有坚持从整体出发谋划全局，统筹局部，才能促使改革取得 $1+1>2$ 的成效。对此，“十五五”规划建议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中指出：“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促进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5]这一措施体现了整体性在社会改革与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遵循整体性原则是破解全面深化改革结构性难题的重要方法。从实践逻辑看，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后，深层次矛盾往往跨领域、跨层级交织。

如经济体制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深层关联，仅仅依赖单点突破难以破解这类系统性难题。社会有机体内部充满矛盾，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各领域的目标、进程、诉求并非天然一致，甚至存在张力。只有整体把握并精准识别改革各领域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才能创造条件推动矛盾双方向着有利于整体效能提升的方向转化。基于此，“十五五”规划建议将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发展与安全等重大关系纳入全局考量，体现出抓关键、带全局的系统思维。由此可见，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整体性原则、坚持系统集成，若背离改革体系的整体性，必然导致政策冲突以及资源错配。

整体性原则的核心指向是构建“目标统一、结构协调、功能互补”的改革体系。这一原则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认知前提，承认改革各要素的有机联系，避免因改革领域差异导致目标混乱。这就需要在整体把握中精准识别主要矛盾，以关键领域改革为支点撬动全局，发挥其对其他领域的牵引与支撑作用。进而，通过将总目标科学分解为子系统分目标，并运用“五个必须”实现多样性统一，最终才能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格局，确保各领域改革系统集成、同向发力，实现改革效能最大化。

2. 关联性原则：破除“改革孤岛”

关联性原则本质上是一种“联动思维”，其主要重视改革要素间有机耦合的动态过程，强调必须激活要素间的有机联动，打破行政壁垒、领域界限与路径依赖，构建“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相互赋能”的要素关联网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6]由此可见，全面深化改革本质是“多领域、多层级、多主体、多要素”构成的宏大且复杂的系统，要素间的联动强度决定了系统集成的整体效能。

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与改革各领域的关联性要求遵循关联性原则，通过重构要素关联、激活要素联动、优化协同机制来破解改革“碎片化”的困境。首先，重构要素关联是破解改革“碎片化”困境的前提。改革“碎片化”现象的根源在于要素间关联的断裂，诸如创新驱动离不开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要素联动，只有“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5]，才能真正实现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

展。其次,激活要素联动是释放改革效能的关键。要素关联重构后,还需激活联动才能转化为改革效能。要素联动的强度直接决定着改革效能的高低,仅仅依靠“物理聚合”来重构要素关联,只会陷入“联而不动”的改革内耗。最后,优化协同机制是巩固改革成效的保障。缺乏机制支撑的要素关联与联动难以长久持续,优化协同机制是实现要素关联常态化、长效化的根本保障。优化协同机制强调要通过顶层设计与机制创新,为重构后的要素关联构建稳定的运转体系,着力破解因路径依赖与部门壁垒导致的协同难题。要素关联的稳定性对体制机制的适配具有极大的依赖性,若缺乏配套的协同机制,要素关联将难以持续。“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要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这为系统集成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方法论支撑,保障了要素关联持续稳定运转。

关联性原则的核心指向是建立“要素自由流动、机制协同高效、效能持续释放”的改革生态。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多层级、多领域、多要素,每个领域都有其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必须理顺各要素的功能定位,从而避免要素间的功能冲突、盲目流动和资源浪费。如在教育领域,“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明确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不同类型教育的功能定位,形成各有侧重、相互衔接的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同时,改革呈现出“碎片化”特征的主要原因就是要素流动受阻,改革的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之间的要素难以实现有效对接和优化配置。如何畅通改革要素流动通道,有效的政策引导和制度创新是关键。“十五五”规划建议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提出“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强化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5],表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公共服务共享等要素的相互配合与赋能关系,也进一步说明了促进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

3. 动态性原则:实现动态适配

动态性原则本质上是一种“发展思维”,旨在根据改革的发展进程、内外环境和群众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优化改革政策措施,避免政策僵化和策略失效,确保改革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与群众需求同步。动态性原则是系统集成应对不确定性的科学方法,其要求改革政策与方案具备韧性,摒弃固

化、僵化的发展定式,通过“动态监测—灵活调整”的实践范式,实现改革系统的优化升级。目前来看,“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5],这一现实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及时根据改革进程中的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需求升级,对改革政策与措施进行动态性的优化调整。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地缘政治波动与科技产业革命相互交织,显著增加了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5]。这一重大判断精准把握了时代特征,构成了我国规划发展与改革升级的现实依据。为有效应对挑战,“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强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5]。这不仅是立足内需、稳住经济基本盘的战略抉择,更深刻体现了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驾驭复杂局面的辩证智慧。通过改革举措的动态调整与主动优化,及时适配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从而在风浪中筑牢发展根基、把握长远主动。

从内部需求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随着社会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群众需求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跃升,呈现多层次、多样化、动态演进的结构特征。传统相对单一的发展模式已难以适应日趋多元的民生期待,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政策设计与制度调适中持续呼应民需、推进系统优化。这一逻辑在多个关键民生领域均有明确体现:就业领域着重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积极规范与发展灵活就业及新就业形态;教育领域稳步扩大公共教育服务覆盖范围,探索逐步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着力减轻家庭教育负担;医疗领域则致力于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全面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这些政策始终围绕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展开,并通过动态迭代与系统集成不断优化,不仅体现了改革进程的响应性与适应性,也凸显了政策动态调适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关键作用。

可见,动态性原则的核心指向在于构建一套“精准识别、快速响应、动态优化”的闭环改革方式。实现这一优化,必须以动态监测为“感知中枢”,通

过建立多维度、全过程的实时感知机制,持续跟踪改革进展、预判外部风险机遇、精准捕捉民生诉求、及时识别政策堵点,从而为科学决策与精准调适提供坚实依据。正因如此,一套基于动态监测的反馈与调适机制,对于推动改革贴合实际、响应变化至关重要。它能够从根本上提升改革系统的适应力与自我迭代能力。最终,通过在改革与发展之间构建并保持动态平衡,将有力驱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使改革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切实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 目标系统:系统集成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拓展维度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系统集成方法论以“整体集成、要素协同、动态适配”为方法指引,实现改革效能的整体跃升。这种集成式改革路径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底层逻辑,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具体而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载体,治理现代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治理保障,而“制度—治理—发展”三重目标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制度筑基—治理提效—发展赋能”的系统集成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的跃迁逻辑。

1. 制度筑基:以系统集成锚定改革方向

系统集成作用于改革目标的逻辑起点与核心载体,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机整体。有学者指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四梁八柱’,三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系统集成、运行有序的制度体系。”^[7]其核心使命在于破解制度体系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张力”与“功能性隔离”,通过激发制度间内在的协同效应与互补效应,实现从“制度集群”到“制度体系”的深刻转变,最终达成制度的成熟与定型。

首先,系统集成致力于制度的结构性优化,旨在实现系统功能的“整体涌现”。制度体系绝非各项制度的简单加总,而是一个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具有清晰层级架构与内在逻辑的复杂系统。系统集成的首要任务,是运用系统架构思维对这一体系进行战略性、全局性的设计与优化。这不仅要明晰功能定位与权责边界,精准界定各层级、各领域制度的核心功能、作用范围及权

责关系,确保制度单元自身设计的科学性,避免功能重叠或监管真空。同时还要优化制度间的“接口”与“链路”,重点破除部门利益和传统行政分割造成的制度壁垒,精心设计制度间的衔接机制与传导路径,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其次,系统集成聚焦于制度的适应性调适,以增强其应对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动态韧性。制度体系必须成为一个能够与时俱进、自我完善的“活系统”。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同时,要清醒看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8]通过建立制度评估与反馈闭环,构建常态化的制度效能监测评估体系,运用大数据、社会调查等手段,实时追踪制度运行状况,精准识别制度供给与治理需求之间的“缺口”或“错配”,为改革政策的立、改、废、释提供科学依据。注重强化制度的弹性与包容性,在保持制度框架稳定性的前提下,预留必要的“适应性接口”,允许地方在统一顶层设计下进行差异化改革探索,并将成功的实践经验及时吸纳、上升为全国性制度安排。这种“试点—评估—推广”的机制,本身就是系统集成方法论中动态性原则的生动体现,确保了制度体系既具备原则性又富有灵活性,能够有效应对内外部环境的急速变化,确保改革实践紧跟时代形势。

最后,系统集成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8]58}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党的领导要始终居于统领地位,这是确保整个改革制度体系科学制定、协同配合、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党的坚强领导是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重要保障,其能够为改革各领域、各层级、各主体间的制度创新提供共同的价值基准和决策支持,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始终以满足人民需求为要务。同时,党的领导的强大政治整合力与组织动员力,能够有效统筹和调动各方资源,保障制度改革的整体性、协同性、动态性,避免改革的内耗与方向混乱造成的改革局部化、碎片化问题,进而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可以说,系统集成在制度维度的应用,本质上是运用系统性思维与工程学方法,对社会制度的组

织结构、互动关系与演化路径进行的一次深刻再造。它超越了“补丁式”的制度修补,致力于推动制度体系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反应”,实现功能整合、结构优化与动态适应的有机统一,从而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筑起更加完备、更加稳定、更加管用的根本性制度支撑,为全面深化改革谋定方向。

2. 治理提效:以要素协同释放改革动能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目标,其最终指向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现代化的高效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9]系统集成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此为拓展维度,目的就是要打破传统科层制下的“治理孤岛”与“政策缝隙”。系统集成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要求通过重塑治理系统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与作用模式,催化生成一种更高层级的具有整体性、协同性、适应性的治理机制,最终实现治理效能的指数性跃升。

首先,系统集成通过机制性互联与功能性整合,重塑治理的组织结构和流程,是实现“协同高效”的重要基础。“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5]治理现代化绝非各个部门治理能力的简单加总,而是要通过有机整合提升治理效能。一方面,推动跨域协同的制度化与常态化。系统集成要求超越临时性、运动式的“联席会议”模式,通过构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常态化协同治理机制,并辅以先进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数据、资源、指令在治理主体间的无缝流转,从根本上解决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相互掣肘的“碎片化治理”困境。另一方面,催化治理流程的再造与融合。以“一件事一次办”为代表的改革,其本质是运用系统集成思维,对围绕同一治理目标但分散在不同部门的审批、监管、服务流程进行系统性重构和一体化整合,变“群众企业跑腿”为“数据和部门协同”,从而大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治理回应速率与公众满意度。这种基于“整体政府”理念的流程再造,实际上是系统集成提升治理体系内部协同性的生动实践。

其次,系统集成依托数据驱动与技术赋能,革新治理的工具与模式,是实现“精准智能”的技术引擎。在数字文明时代,治理效能的跃升必然与技术革命深度融合,其内在要求是构建“网上网下协同”的“数字孪生”治理范式。通过全域感知和网络一体化数据平台,以系统集成方式助力构建一个与现实治理客体同步映射、虚实交互的“数字孪生社会”。这使治理者能够超越传统经验决策和事后应对的模式,从而转向依托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模拟进行态势全面感知、趋势智能预判和问题精准溯源,实现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见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数字孪生”治理范式的实现要基于算法的精准施策。在宏观层面,系统集成支持利用大数据模型对经济社会运行进行实时监测和动态仿真,为宏观调控和政策制定提供精准依据。在微观层面,它使“精准画像”和“差异化治理”成为可能,通过精准滴灌、分类监管等举措提升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

最后,系统集成是培育治理系统动态适应,实现改革发展的韧性与可持续性的内在要求。现代化治理体系必须具备应对当前高度不确定性“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韧性。系统集成则是将治理体系本身设计为一个能够根据环境变化实现政策措施动态适配的系统。要实现治理的动态适配,需要建立覆盖治理全过程的效能监测评估体系和多元反馈渠道,形成具有敏锐感知力的“神经网络”,并能将反馈信息迅速转化为政策调适、规则修订、资源重配的行动,从而实现治理体系的自我优化与迭代升级。由此可见,通过系统集成的方法,不仅能够促使治理提效,还能快速激活改革动能,增强治理体系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总之,系统集成在治理维度的价值,在于其通过“机制—技术—能力”的三重赋能,系统性地重塑治理的形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结构性优化与治理能力整体性跃升的辩证统一,构成系统集成方法论跃迁的重要维度。

3. 发展赋能:以动态适配推进改革升级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任务,体现了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与发展动能的系统性转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

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8]10}系统集成在此维度的核心使命,在于突破传统增长路径的“锁定效应”与“结构性矛盾”,通过激发经济系统内生的创新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实现对旧动能的超越与新动能的整体性重塑,从而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首先,系统集成驱动创新生态的系统性建构,是实现动能转换的“核心引擎”。新质生产力的孕育与发展绝非单一技术突破或产业政策的产物,而是一个由创新主体、制度环境、要素配置、基础设施等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结果。这要求系统集成必须致力于做到以下两点:其一,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融合壁垒”,通过系统性布局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无缝衔接。这同时也意味着必须同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改革、金融支撑体系改革和产业政策调整,形成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良性循环,避免研发与市场“两张皮”。其二,优化创新要素的“系统化配置”,将人才、资金、数据、知识等核心创新要素视为一个整体,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协同,引导其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效集聚、自由流动、碰撞聚合,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前沿产业集群,从源头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其次,系统集成促进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优化,是提升系统“协同效率”的关键路径。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体系、区域格局、市场结构之间达成高水平的动态平衡,这必然要求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完善宏观治理。具体而言,系统集成主要通过两个层面发力:在产业体系层面,着力推进“网络化协同”,精准把握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通过政策组合推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最终形成梯度布局、优势互补的产业“共生网络”。在区域发展层面,致力于打造“有机生命体”。通过基础设施联通、市场规则统一、公共服务共享等系统举措,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空间内的优化配置,使各地区形成定位清晰、优势互补的“多极网络化”格局,从而释放巨大的结构性潜能。

最后,系统集成保障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演进。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

展,这决定了系统集成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要将生态文明理念深度融入经济社会改革全过程。“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5]。这一决策要求我们不仅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的“循环体系”,推动发展从依赖物质资源消耗向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转变,还要求我们要强化风险防控,致力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确保改革的稳健性与可持续性。

三 实践方略:系统集成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构建

系统集成方法论不仅是一种理论认知和目标体系,更是一套具有鲜明实践导向的行动框架。它内在要求的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原则,更深入要求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通过顶层设计的战略性规划、协同共进的机制性互联、动态调整的适应性进化等实践路径,将系统集成的方法论指导转化为提升改革整体效能的现实力量,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而持久的动力。“十五五”规划建议立足新阶段发展需求,将系统集成思维嵌入经济转型、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等各领域,实现了系统集成方法论的实践范式跃迁,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筑牢实践根基。

1. 整体谋划顶层设计:确立改革的整体战略框架

顶层设计是系统集成方法论在实践起点上的集中体现,其本质是运用系统性思维与工程学方法,对改革这一复杂社会系统工程进行全局性、长远性的战略谋划与结构塑造。对此,“十五五”规划建议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中强调要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促进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十五五”规划建议深度把握了整体谋划顶层设计的实践要求,其从跨区域协同发展的顶层布局,到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机制性耦合,再到民生政策随群众需求变化的动态优化,打破改革的“碎片化”困境,构建“根基—骨干—血肉”整体贯通的战略体系。需要看到的是,它绝非简单的规划制定,而是对马克思主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科学方法的深刻实践,即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总目标,具体化为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子系统的改革分目标,并综合集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总体方案。

坚持整体性原则进行顶层设计,核心在于构建层次清晰、功能互补的制度系统架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8]6}这要求我们将制度体系视为一个“有机生命体”:根本制度是决定系统性质的“根基”,具有最高权威性和统领性;基本制度是支撑系统框架的“骨架”,是对根本制度的细化和展开;重要制度是确保系统活力的“血肉”,是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具体践行形式。以上三者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系统集成的物理载体。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10]以“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为例,其顶层设计以“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根本制度,又通过“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等基本制度细化改革路径,最后以“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等重要制度破解改革难题,形成层次分明的改革图谱,这正是为全面深化改革绘制这份兼具“大图样、总图样和小图样”的系统蓝图。

顶层设计的目标体系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实施坐标。“十五五”规划建议在推进农村现代化方面的顶层设计鲜明体现了系统集成谋划顶层设计的理念,其将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总目标细化为解决好“三农”问题,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等阶段性目标,再分解为产业帮扶、就业扶持、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等具体任务,形成“整体目标—领域目标—具体任务”的三级目标链,确保了每项改革举措都能精准对接战略需求。对此,“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要“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坚持精准帮扶,完善兜底式保障,强化开发式帮扶,增强内生动力,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健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支持政策,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5]这意味着在操作层面,需将总目标、根本目标分解为各领域的分目标、阶段性目标和优先目标。这些目标之间必须相互

契合、相互支撑,形成一个目标网络系统。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11]这更进一步要求制定明确的、细化的、量化的目标体系,为顶层设计提供根本遵循和评估基准,确保各项改革举措都能锚定共同方向,打破部门与地区壁垒,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改革的系统布局。

总之,顶层设计作为系统集成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首要环节,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战略统筹与系统谋划,将改革从“局部试验”推向“全局优化”。这一过程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系统观为理论基石,以系统集成思维将制度建设作为贯穿顶层设计的逻辑主线,实现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分层构建,形成“根基稳固、骨架强健、血肉丰满”的现代化制度体系,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战略坐标。

2. 协同部署创新机制:构建改革的要素协同机制

协同性是系统集成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关键机制。它要求破解传统改革模式下“条块分割、单点突进”的困境,通过机制性互联与功能性整合,重塑改革举措间的互动关系,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动态适配的改革合力。这既是应对改革体系集成性、关联性、动态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传统“生生之谓易”哲学智慧在改革实践上的体现。协同部署创新机制旨在寻求系统各要素间的最佳平衡点和最优状态,构建起改革要素协同配合与相互赋能的机制。

协同共进首先体现在不同领域改革举措的相互配套与双向赋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强化系统集成,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8]51-52}。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尤为典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优化机构、提升效能;反之,政府治理效能的提升又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更优制度环境。这种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关系决定了任何单一领域的改革都必须在其他领域的协同下才能深化,必须运用系统集成方法,加强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制定出能引发良性循环的政策组合。这一逻辑在实践中必然要求建立跨领域的协同推进机制,通过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与评价联动,促进关键要素间的良性互动与深度融

合。在教育、科技、人才等关键领域构建一体化的部署,正是为了系统性地重构要素间的关联性,形成支撑有力、协同高效的联动机制,使各改革要素紧密配合、相互促进。其中,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协同联动,深刻诠释了要素间相互支撑的逻辑:科技创新为产业突破技术瓶颈、规避“卡脖子”风险提供核心动力;产业升级则为科技创新开辟应用场景与市场空间,确保研发活动的实效性与持续性。改革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内在决定了必须通过系统集成,以“要素协同”的方式进行整体部署,这深刻体现了在整体利益优先原则下,推动改革纵深发展的实践逻辑。

协同共进同时也要求在同一领域要保持改革举措的连贯性与继承性。改革是一个持续推进、逐渐深化的历史过程,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才能确保改革方向不偏离主线。“十五五”规划建议高度重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延续性,其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这正是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政策的继承与延续。再如2005年国务院首次提出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原则,到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再到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将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这一系列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持续推进正是纵向推进改革的鲜明表现,其保证了全面深化改革稳中有进。

从本质上看,“十五五”时期的协同部署创新机制,既是对系统集成方法论的实践深化,也是对中国改革规律的深刻把握。它不再追求单一领域的快速突破,而是更注重整体改革的协同推进;不再满足政策表面的衔接,而是更强调利益深层的协调。这种协同逻辑,既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筑牢了实践根基,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系统合力。通过各领域、各区域、各阶段改革的协同共进,让改革的“每一步”都服务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目标,让发展的“每一环”都衔接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蓝图,从而最终实现改革效能的最大化、改革成果的普惠化。

3. 动态校准改革举措:完善改革的动态适配策略

系统集成将改革视为一个动态开放、持续演化

的现代化社会建设过程。这就决定了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必须随着社会变迁不断作出动态调整才能不断解决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矛盾与新问题。因此,只有建立灵敏的动态监测、评估、反馈、调节机制,才能使改革系统能够及时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进行自我优化、动态适配。这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思想和现代系统科学中控制论“监测—反馈—调节”的核心原理。

首先,动态调整机制本质上是“实时监测—效能评估—过程调整—动态优化”持续循环动态的改革系统。这一机制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的跟踪监测,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对改革效能进行精准评估,进而准确把握改革举措的具体作用和实施效果。这种动态调整不是简单的政策修补和措施替换,而是基于系统集成思维的战略性校准,旨在确保改革方向与发展需求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对此,“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要“强化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健全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机制”^[5],这一重要论断为改革政策和措施的“立、改、废、释”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科学支撑。唯有如此,系统集成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避免“改革疲劳症”和“路径依赖症”,在动态平衡中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跃升,最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续的动力支撑。

其次,动态校准改革举措必须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十五五”规划建议起草说明强调,谋划改革需以奠定现代化坚实基础为着眼点,以应对变局与突出问题为着力点。这一方法论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既要针对具体问题精准施策,更要始终围绕总体目标系统推进,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调整。改革举措的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要求要基于系统集成的关联性原则,建立改革领域、要素、举措的关联性分析框架,准确把握各领域、各要素改革之间的传导机制和叠加效应。为此,必须强化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推动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环保等多领域政策协同发力,共同塑造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这种对政策协同性与系统性的高度重视,不仅旨在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整体效能,更从实践层面确保了改革能够沿着正确方向系统推进,从而实现改革效能的最大化。

(下转第89页)

适与文化选择。沈从文通过书信集建构的多重身份——私密的朋友、公共的编者、经典的作家——折射出中国现代文人在社会变革期的复杂姿态与多重担当。在这些书信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文学启蒙与现实关怀、个人表达与群体责任之间不断协商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这种协商不仅体现在文字层面,更深深嵌入在书信这一文类的形式特征之中。书信本身的对话性使沈从文得以保持启蒙者的姿态而不显得过分说教,其私密性又为他在公共领域保留了一方个人自由表达的天地,这种微妙的平衡,正是“废邮存底”最具现代性的特质之所在。

参考文献:

- [1]陈新仁.语用学视角下的身份研究——关键问题与主要路径[J].现代外语,2014,37(5):702-710.
-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24.
- [3]金介甫.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M].符家钦,译.北京:新星

出版社,2018:1.

-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7.
- [5]解志熙.“最后一个浪漫派”的理想之重申——沈从文佚文辑校札记[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6(2):90-94.
- [6]陶水平.文学艺术场域学术话语的自主、开放、表征与竞争——布尔迪厄的文化场和艺术再生产理论探微[J].中国文学研究,2017(2):5-14.
- [7]吴立昌.论20世纪30年代“京”“海”之争[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2):112-121.
- [8]徐强.沈从文《新废邮存底》中四篇非书信文章的文献释证[J].新文学史料,2015(5):139-147.
- [9]付祥喜.中国现代作家书信的“公”与“私”——以鲁迅书信与文集、全集编纂为例[J].文学评论,2022(3):70-80.
- [10]金宏宇.中国现代作家书信集及其研究[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2(2):62-69.

【责任编辑 芮 芳】

(上接第15页)

最后,动态调整的根本立场在于坚持人民至上,积极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就要求在改革中必须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贯穿始终,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从而在满足民生的过程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因此,动态调整尤其体现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关键民生领域。它要求建立并畅通多元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与灵敏的政策反馈机制,依据人民群众需求多样化、个性化、升级化的趋势,及时对改革举措进行适应性调适与完善。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改革的进程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步提升。

系统集成方法论通过“顶层设计—协同共进—动态调整”的三维驱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规划—实施—反馈—优化”行动闭环,强力驱动着“制度—治理—发展”目标在螺旋式上升中实现系统性跃迁。它为我们提供的,不仅是一套驾驭复杂巨系统的解决方案,更是破解超大规模国家治理难题、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方法论指引。

参考文献:

- [1]张明军,李天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集成方法[J].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4,3(6):40-52.
- [2]陈胜云.系统集成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科学方法论的理论阐释[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4(1):36-42.
- [3]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94.
-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8.
- [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1).
- [6]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76.
- [7]刘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结构定位、实践成效和完善路径[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8(1):66-73.
- [8]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49.
-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12.
- [1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4.
- [1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N].人民日报,2025-10-29(1).

【责任编辑 王 涛】